

构建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基于“社会资本”的解释框架

袁柏顺，牛杰会，宁超

（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在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中，存在着多主体和多头部门、多元组织导致的社会管理“碎片化”问题。基于解决“碎片化”困境的需要，必须探索构建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析出“信任”和“互动”两个维度变量，来构建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的分析框架，提出最优交互模式、中性交互模式、稳态交互模式、低效交互模式四种分析路径，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来阐释每一种交互机制在社会资本的视角下的内在联系和实现机制。

关键词：社会管理；整体政府；社会资本；交互机制

中图分类号：D035, D638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治理和碎片化困境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体系中，普遍认为存在三种主要的力量：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同时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的差异，国情的区别，尤其是政治力量结构，制度环境，历史的迥异，导致这三股力量的作用能力和范围呈现较大的差别。但一般认为，整合三种力量的协同交流和互惠的合作机制，共同构成了一个良性的“优态”化社会管理的治理体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治理表现出应对社会结构的复杂，阶层关系的紧张，行业竞争的加剧，地区差距的扩大等严峻形势，依赖于某一种单纯的力量难以实现错综复杂社会治理难题的解决，因此，必须寻求一种交互的复合式社会管理的治理模式。

西方国家自上个世纪 70、8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府改革运动，也即是对各种组织力量在社会管理中作用，角色和相互关系的一个反思和审视。新公共管理的“企业家政府”典型代表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对于不同组织力量及其作用领域，活动机制等做了著名的“优势度”区分：公营部门最适合政策管理和实现公平的领域；私营部门则在追求效率的领域上往往有上佳的表现；而第三部门则在不太能产生利润的行业往往表现出优势。^[1]可见不同性质的组织在处理具体的社会管理事务中具有不同功效，为了实现“新治理”¹的目标，必须构建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协同整合的管理范式。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深水区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带动的“社会总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一般项目（2013RKB01454）

作者简介：颜克高（1979-），男，湖南娄底人，博士，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井荣娟（1990-），女，山东泰安人，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宁超（1990-），男，山东临沂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¹ “新治理”的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公共问题的治理已经成为需要私人部门、非营利部门和政府协同参与的团队工作；二是众多部门的合作治理并非自我运作的，它面临着组织和管理方面的巨大挑战。详述参见 Lester M. Salamon and Odus V. Elliot. *Tools of Government: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06-611

体性”的变迁亦不可避免。但是由于长期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现实制约，“政府管控”逻辑思维羁绊，以及“单位制社会”等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的社会管理发展很不充分，协同式参与社会管理尚未成型。同时，市场经济活跃的企业和第三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由于职责不明，权责边界模糊，协调不畅等，难以实现良性的社会治理。现实中大量的案例和事实证实，在社会管理中由于存在大量的政府部门，繁多的企业，庞大的社会组织，仍存在难以协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尤其表现于公共突发事件的处理，政府各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等等各自为战，未形成统一的协调和整体的协作，导致行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因此，在社会管理的情境化事件处理中，不仅要认识到各种组织的优势，还要探寻和构建一套高效的多元主体的交互协作治理模式，进而化解多元治理的社会管理“碎片化”的问题。因此，与多元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的建设问题，即需要探寻在社会管理的交互治理中各种组织的协作交流和互动合作。

二、超越碎片化：构建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

虽然各国政府行政实践和学界都有关于社会管理的协同处理尝试和理论探讨，以整合实现整体统一的效应，但是随着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复杂化，相关研究愈发增多。表现为“协同政府”，“水平化政府”，“网络化治理”，“跨部门协作”，“全面政府”，“整体政府”等等，都是社会管理的交互的探讨概念和理论体系。虽然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和着眼点有细微的区别，但共同点都是强调制度化、经常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以增进公共价值。

[2]

“整体政府”理论是西方目前关于政府改革的最热点和核心研究理论。“整体政府”理论源于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新公共管理的追求政府高效率的部门分割，职责分工的设计体系导致了部门为了自身私利，刚性设置制度障碍，阻碍了政府的“总体”政策效度，导致“碎片化”现象的产生，同时，部门的自我权力意识的强化，导致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同缺乏必要的基础，损害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其次，新公共管理过分追求政府放权，采纳“经济”理念和“市场”的方法来“经营”政府，政府的权力被弱化，尤其是向市场和社会转移权力的地方政府，其政府权威流失严重，个体组织力量之间的竞争导致协作缺乏稳定的交流机制，难以实现高效的社会管理。再次，目前的社会发展和转型的现实要求，进一步的发展使中国面临“中等发达国家陷阱”，碰到“刘易斯拐点”，直视贝克的“风险社会”，为了降低我们由风险的“制度化”向“制度化”的风险的社会转变，我们需要在社会管理的情境中构建一整套交互的社会治理体系。最后，现代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解构了原始的政治生态，减少了社会间不同群体的交流和沟通，市民阶层希望服务和社会治理的选择更贴近他们的真实需求，因此从思想上导致由原子模式向更加强调整体式性的分析路径的转变。^[3]

良性的社会管理需要实现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交互合作，优势互补，进而达到社会管理的“优态”互动治理，与“整体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著名

的牛津大学教授 Bogdanor 在其《Joined-up Government》中认为：“整体政府”理论与遵循经济学逻辑新公共管理改革不同，“整体政府”主要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而非经济学的理论。^[4]波利特（Christopher Pollit）教授认为：“整体政府”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改革模式，它包括四个方面内容：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5]派瑞·希克斯（Perri 6）则认为：“整体政府”理论核心的九大基本职能有①部门间主义；②跨功能合作；③以网络为中心的协调机制；④中央集权化及增设机构扩展其职责；⑤限制机构转嫁成本的能力；⑥协同服务生产方式；⑦个案管理者；⑧信息管理与跨组织边界整合；⑨整体预算与采购。^[6]可见，“整体政府”的核心追求是政府内部不同行政层级及部门之间的整合、政府与社会的整合，政府直接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协同和社会与社会的整合来实现社会管理的协同目标，整合（integration）是整体政府最本质的内涵。从而实现各个社会管理参与主体的优势，实现高效，稳定的社会治理。整合式交互是处理社会管理多元主体导致的治理“碎片化”困境的机制选择。

如果交互是高效，稳定的机制，那么如何促进各个主体能够交流和互动？假设交互成为社会管理的共识的话，就需要探索走向社会管理交互的路径选择和制度设置。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理解和推进交互体系的分析架构，该架构将结合案例来分析说明，在具体的社会管理的情境中，怎样推进以及如何推进交互机制的问题。

三、社会管理的协同机制：界定性框架与案例分析

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涉及的是不同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因为个体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动机的差异导致其运作的动力机制差别巨大。有些交互是双方通过信任交流就可以实现的，有些交互则不可能通过交互实现；有些交互是在平等的地位中整合实现的，有些交互是在不平等的主体间实现的；有的交互是在互惠“双赢”中实现，有些交互是在“零和博弈”中达成。这种协同的复杂性关系使理论的深入探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虽然交互问题效果显著，交互的问题备受关注，但是对于具体的情境化仍缺乏稳定的理论基础。正如美国阿格拉诺夫教授所言：“尽管协作性管理明显凸显，但仍然不存在一个相当于——或者甚至接近于——官僚体制管理范式的知识基础，相反，关于公共机构的协作观点来自于多门学科和多种传统理论……”^[7]，但是“协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研究才刚刚开始”^[8]和希克斯的话语所示“21 世纪政府改革的新议程变得更加明确，其核心理念和目标就是始终的整体政府”。^[9]

因此，假设仅仅将问题聚焦于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和交互领域，那么构建一个理论体系就显得异常复杂和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为此，需要从交互机制所涉及的核心变量出发，来解构协同机制背后的逻辑和关系脉络。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析出了“信任”和“互动”两个核心变量，按照信任-互动反馈的逻辑架构实现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的创建。

社会资本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由西方社会学界引入到国内的关于社会问题分析的最新

分析理论基础。社会资本已被广泛应用于国内的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用以分析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

追根溯源,“社会资本”最先由布尔迪厄提出,经过科尔曼,普特南等人发展,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学科概念体系,目前西方普遍研究“社会资本”呈现的是:普特南(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有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10];科尔曼(1990)则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11];林南(2006)坚持认为社会资本有利于社会行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12];福朗西斯·福山(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社会资本同其他形态的人力资本不一样,它通常经由宗教,传统,历史文化机制建立起来的^[13];布尔迪厄(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总和,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14];斯蒂格利茨(2003)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包含隐含的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陷阱和动机问题的方法”^[15]。因而,笔者将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归结为:信任,规范,互动和激励。因此社会管理的交互式治理模式框架分析如下:

(一) 界定交互关系的两个变量

1. 信任。所有的交互机制都涉及信任问题。不同组织之间是否相互信任是交互机制形成的基础。在许多的交互网络中,普遍认为彼此信任是交流和合作的前提性条件和关键环节。信任作为一种主管的意识,取决于彼此之间的信息反馈和主体间的主观判断,相互之间的信任有助于交互机制的实现,正如福山所言“信任的作用就像一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16],可以营造一套具有普遍信任感的社会风气,往往会塑造一种超越于和高于利益分歧和价值差异的共同体意识。但许多情境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不信任导致组织之间的分离和冲突,甚至对立和抗争。当需要信任的各个组织出现不信任的时候,交互还能否实现?实际上,大量的案列表明,相互的不信任也会形成交互效应,因为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不平等的,不信任的圈子里某一方(主要是政府)在交互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从而凭借组织的资源实现交互模式的构建。比如在企业 and 第三部门协同处理的具体社会管理事务中,政府作为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组织,凭借国家权力和威慑力强迫他们建立交互机制,政府掌握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向,因此两者屈服与政府,实现了不信任情形下的交互模式的建立。

因此,信任不是交互机制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具体的情境中的主体信任是交互机制的重要变量。彼此之间的信任,直接影响了各个社会组织在交互机制中的作用,形成怎样的交互机制,以及是否需要一个主体在特定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2. 互动。社会管理的各个主体之间可以是信任的,也可以不是彼此信任的。但是达到交

互的效果，各个主体之间必须是联系和交流的。联系是基于信任基础上的信息交流，政策协商，资源整合，过程控制，结果分析的流程关系。联系在交互机制形成构架中是桥梁的作用，是各个主体彼此交互的必要过渡和中间层，联系实现了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政策分担，职能划分，提高了交互的整体效度。彼此之间未形成联系，是否会达到交互的效果？答案是否定的，未形成联系，必定不可形成交互机制。因为交互机制的内在逻辑蕴含着联系和交流，交互即是交流和互动，没有联系，哪有交流？没有联系，哪有互动？因此，可以断定联系是交互机制的必要条件，社会管理的主体之间缺乏联系，难以实现交互的理想效果。

因此，联系的状态和频率，以及联系的效度决定着交互机制的效果。某种意义上讲，互动是交互机制中最核心的要素和最重要的变量。构建主体间的社会管理的交互网络体系，必须加强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是交互机制是否实现的“生命线”。

本文将社会资本概括为：信任，规范，互动和激励。对于社会管理的界定性框架选择要素是信任和互动，对于规范和激励因素的摒弃，笔者认为规范属于一种无形的强制性力量，规范的主导在于政府，政府凭借其强力掌握社会的管理权，企业和第三部门依附于政府的资源分配予以发展，在规范的天平上是本质不平等的，本文力图构建的社会管理的协同机制，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对话和协作，因此，笔者舍弃了规范。对于社会资本的另一个要素激励，笔者认为政府的激励主要是政府公务员的晋升和绩效考评，企业的最大激励来自于对于利润和最大收益一成本的思考，第三部门的激励来自于其组织的愿景和使命，在社会管理的协作性治理境遇中，激励因素难以实现多元主体的价值趋同，不利于“优态”治理的实现，因而，本文以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动为核心变量，进而构建一个社会管理的新的界定性框架。

信任和互动是两个变量的组合形式，两者可以形成四种关系类型：信任充分-互动频繁；信任充分-互动匮乏；信任不足-互动频繁；信任不足-互动匮乏。这四种类型形成了四种模式方块，分别意味着四种社会管理的交互模式：最优交互模式、稳态交互模式、中性交互模式、低效交互模式。

本文通过这四种交互的形式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的分析框架（见图1）。以下将结合相关案例进行分析，阐释四种交互模式的具体情境和运作方式。

	信任充分	信任不足
互动频繁	最优交互	中性交互
互动匮乏	稳态交互	低效交互

图1 社会管理的交互体系的分析框架图

（二）界定性框架与案例分析

1. 最优交互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由于拥有充分的信任和频繁的交流 and 互动，各个主体

之间的目标和利益得到一致认同,实现了社会管理的主体之间最佳的资源配置和良性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最优路径的选择,主体之间可以形成制度化的交互合作机制。

新泰市平安机制建设的主要载体就是“平安协会”,“平安协会”印证了最优交互模式的实践模型。新泰市平安协会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平安机制的逐步完善。“平安协会”是在党委,政府领导和综治委,公安机关指导下的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维护治安稳定的群众性自治防范组织,是辖区单位和个人自愿加入,依法成立并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平安机制”的具体内涵指: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群众路线为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胆创新,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善于运用现代科技和手段,切实夯实和加强县乡两级政法综合治理工作,以群众性社会组织(平安协会)为基础性构成要素和联系纽带,构筑处置突发事件和日常管理网络相结合的完善综合性社会管理机制,我们不妨称平安机制为大的“立体三角架构”(见图2);处置突发事件为小的“立体三角架构”。^[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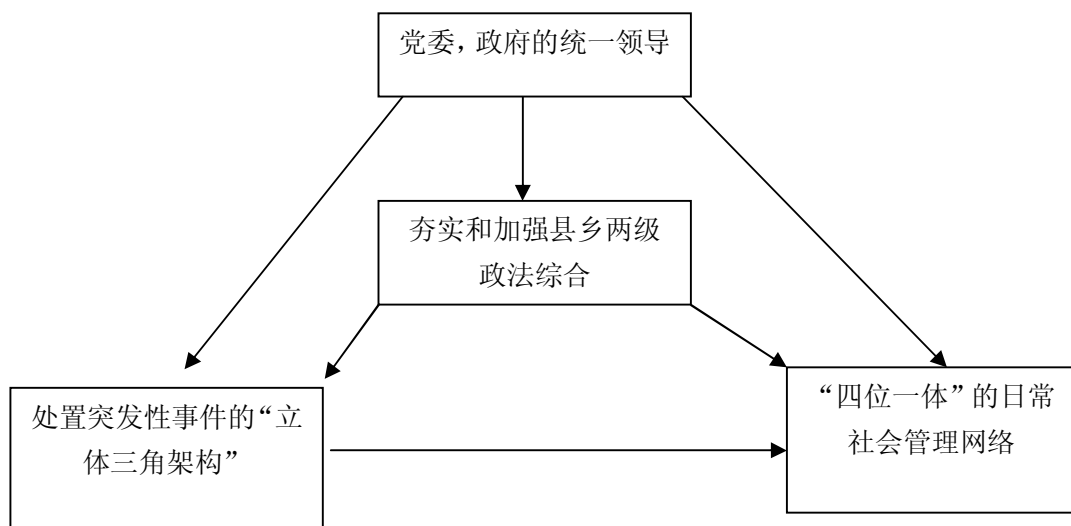


图2 平安机制的“立体三角架构”

新泰市的“平安机制”建立了最优交互社会管理方式,实现了充分的交流,民众,第三部门,企业基于充分的信任参加其中,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优态”的社会治理构建,因此,频繁的交流 and 充足的信任可以发展形成制度化的社会管理交互机制。

2. 稳态交互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信任充分,但是交流匮乏,互动不足。当参与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是信任的,但碍于特定的条件的制约和限制,未实现充足的交流,可能损害了整体式协作交互治理的效度,单只是一些突发的事件中,许多组织或部门在其中的关系就是彼此信任,但是未能实现充分的交流,为了应对共同的问题,需要再次沟通,协调合作,我国大量的突发事件的处理采取的就是稳态交互的社会管理模式。

汶川地震中的第三部门 and 企业的协同行为,便是稳态交互的典型案列。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中,国内的非营利组织 and 非政府组织联合以集体的形态出现在抗震救灾的

最前线，相对于过去，这次的第三部门未有从前的那样独立行动，而是以协同的方式出现在灾情面前。5月13日，以《公益时报》携手南都基金会等为代表的102家机构发表了《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四川灾情严重的地方出现了两个大型的非营利组织的联盟。这些非营利组织之间相互协同，联合行动，集中资源，合理配置帮助政府实现了灾害损失进一步降低的目标。灾难的突发性难以实现，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但是在灾情的第一线出现的为灾民排忧解难的是第三部门。正是由于政府，第三部门之间的充足信任，虽然交流匮乏，还是实现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稳态交互模式往往出现在大型突发性灾害面前，灾害过后就会自动消解。这种模式下由于缺乏特定的交流机制，各方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合理利用，也可能由于信息掌握的程度不同，产生冲突。为了实现交互式社会管理的良性治理结果，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逐步过渡到“最优”的交互模式，实现社会管理的“优态化”处理。

3. 中性交互模式。在此模式中，典型特征是交流频繁，但是信任不足。信任不是交互机制的必要条件，交流是交互机制实现的“生命线”。碍于信任不足，可能导致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割据，争夺资源，参与社会管理中有所顾忌和保留，难以达到良性的社会治理效果。在这种模式中，力求实现高效的社会治理，需在交流和沟通的基础上，加大彼此之间的信任 and 了解，减少隔阂和行动障碍，避免冲突和不良社会管理局面的出现。

中国民间对于PX项目谈虎色变。2013年7月30日凌晨，福建漳州古雷对二甲苯(PX)项目发生闪燃事故，再次引发中国民众对PX项目安全性的高度关注。自2006年的厦门因PX产生的群体抗议事件以来，PX项目问题已演变为一个公共问题，一个棘手的社会管理问题。为何能带来巨大收益的PX项目，意在遭受民众的反对和抵制，关键在于“民众对于企业的不信任”，对于“政府的不信任”²。虽然我们发现在2006年的厦门PX项目处理上，对于民众的抗议和反对，自2006年12月8日开始政府和企业频繁与民众交流和沟通，首先在厦门市委主办的厦门网上，开通了“环评报告网络公众参与活动”的投票平台，接着12月13日，翔鹭腾龙集团(PX项目方)办公室通过媒体发布了《翔鹭腾龙集团致厦门市民公开信》，同时12月13日，厦门市政府开启公众参与的最重要环节——市民座谈会，驻厦中央级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以及厦门本地媒体，获准入内旁听，会议持续进行了四个小时，在12月14日，第二场市民座谈会继续举行，随后12月16日，福建省政府针对厦门PX项目问题召开专项会议。会议的结果是PX项目继续，迁址至漳州。但是近来漳州的“闪燃”事故，再次引发了民众的不安，一个利民利国的好项目，为何频频遭受质疑？政府和企业历次向民众解释PX是低毒的安全产业，但是民众依旧不信任。由于公众的不信任产生大量的集体事件，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管理工作。

我们知道PX项目的问题根本在于民众对于企业和政府的不信任，不信任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和项目对于周边居民的利益补偿机制的不健全。在这种典型的中性交互模

²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http://ciccp.xmu.edu.cn/?p=350>

式中,交流增加,但是信任仍然匮乏,关键在于交流核心信息,形成利益共同体,塑造整体的价值观和公共精神的养成。对于完善中性交互模式的制度选择是,参与社会管理的各个主体之间交流之中充分共享足够的核心信息,减少利益隔阂,实现向最优交互模式的发展。

4. 低效交互模式。此模式的表现信任不足,互动匮乏。因为参与社会管理的各个主体之间由于信任充分和交流频繁,会形成目标一致,利益趋同的持续的,长效的制度化协作交互模式,但是低效交互模式恰恰是低度信任,低频交流。由于多元主体的利益取舍,价值取向不同,政府追求“公共性”和“公共价值”,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第三部门追求其特定的组织愿景和使命等等,未统一的价值选择,行动的偏向分离,政策措施的区别对待等等严重侵害了组织间的交互的效度,降低了联合协作的社会治理的成效。

“微博炫富”的“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陷入“诚信危机”。事情起因源于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郭美美事件”引发了民众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捐款运作的质疑,红十字会作为一个慈善的第三部门存在着,捐款资金的运作和支配不透明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危机,“微博炫富”由单纯的个体事件向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转型,俨然成为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处理,后续各方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民众之间未进行充分的交流,同时因为“郭美美”事件,加重民众对于红十字会的不信任,甚至是对政府的不信任,结果是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2012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³。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合理布局和国家整体资源配置。对于“郭美美事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冷淡方式处理,并未澄清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作为第三部门监管部门的政府以民政部为核心的国家政府机构也未对相关事件的责任人和单位进行调查和处理,尚未披露任何有重大价值的消息。政府,第三部门,公民协同参与的社会管理事务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交流和充分的信任,导致市民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失去信心,结果是社会捐赠大量减少,整个社会的捐助数额锐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郭美美事件”中低效交互机制得到充分的显现,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民众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政府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等等,同时各个社会管理主体未就对于“郭美美事件”达成一致的提议,因此造成我国慈善事业的巨大损失。对于低效交互社会管理的改善在于首先加强交流,扩大信息的覆盖面,向中性或是稳态交互模式发展,随后,交流的频繁和沟通的深入,各个主体之间逐步形成良性的信任机制,蜕变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公共理念,向最优交互模式演进。

四、结语

³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963871.htm>

交互模式是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当有至少两个主体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活动中时,就会自发产生“交互”的需求。问题是,交互模式不一定必然出现,在从目前的“碎片化”社会管理向交互式社会管理迈进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因素制约着交互以及发生何种交互的关系模式。

社会管理的交互机制的模型表明,交互机制的背后逻辑是不一样的,不同交互模式下的运作机制、行为选择和结果状态是不同的。分析交互在何种情境中发生,以及会发生怎样的交互机制,有助于引领社会管理实践中有选择的推进协同的交互机制的选择和构建。上述四种交互模式的分析,意在通过对于复杂理论的抽象化解释说明,来阐述交互机制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思维模式。但现实的交互模式要更加复杂和纷乱,在很多时候存在多元的交互模式关系。因此,交互模式的本身复杂性,导致社会管理的交互模式备受重视,但一直缺少一个基础的理论性分析框架,本文的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尝试对于社会管理的交互式治理模式的构建,正是力求对于交互理论的演变和推进有所助益。

参考文献

- [1] [美]戴维·奥斯本, 特德·盖布勒.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 [M]. 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20
- [2] 汪锦军. 构建公共服务的协同机制: 一个界定性框架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 (01): 18-22
- [3] T.Christensen, P.L. Greid. The Whole-of-government-approach-Regulation, Performance, and Public-Sector Reform. Stein Rokkan Centre for Social Studies, 2006
- [4] Vernon Bogdanor. Joined-up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 Christopher Pollit.. 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3, 1 (01): 35
- [6] Perri 6. Holistic Government. London: Demos. 1997. p. 71
- [7] [美] 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圭尔. 协作性公共管理: 地方政府新战略 [M]. 李玲玲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2
- [8] [美] 罗伯特·阿格拉诺夫、迈克尔·麦圭尔. 协作性公共管理: 地方政府新战略 [M]. 李玲玲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78
- [9] Perri 6. Holistic Government. London: Demos. 1997. p. 71
- [10] [美] 罗伯特·普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94
- [11] [美] 詹姆斯·S·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354
- [12] [美] 林南. 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 [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8
- [13] [美]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M]. 李婉蓉译,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35
- [14] P.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A]. John Richardson (ed.) H and 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Z].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6: 1241- 1258

- [15] [美] J. 斯蒂格利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 转自曹荣湘选编.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3: 115
- [16] [美]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彭志华译, 海南出版社, 2001: 125
- [17] 房宁. 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234, 236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manag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social capital"

Yuanbaishun, Niujiehui, Ningchao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00)

Abstract: Social management in multiple subjects, there are more body and long division, pluralistic socie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led to the "fragmentation" problem. Based solv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plight of the need to be explored to buil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precipitation "trust" and "interactive" two dimensions variable from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build interactive social management mechanism, put forward the best interactive mode, interactive mode neutral, steady interactive mode, interactive mode inefficient four species analysis path, and with related case series analysis,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to explain each intrinsically linked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Social management; social capit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overall government

作者简介(可选): 袁柏顺, 1970-, 男, 湖南邵阳人, 博士,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 牛杰会, 1988-, 女, 河南安阳人, 湖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宁超, 1990-, 男, 山东临沂人,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